



ESSENCE AND LABOUR

THE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EORY

# 本质与劳动：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

汪胤 / 著



人民出版社

ESSENCE AND LABOUR

THE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EORY

# 本质与劳动：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

汪胤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封面设计:石笑梦

责任校对:张红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质与劳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汪胤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01-013804-6

I. ①本… II. ①汪…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  
研究 IV. ①B0-0②B8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076 号

### 本质与劳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

BENZHI YU LAODONG;MAKESI ZHEXUE

SIXIANG DE XIANXIANGXUE JIEDU

汪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50 千字

ISBN 978-7-01-013804-6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海交通大学“985 工程”三期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  
(TS0220323001)

## 自序 同时拒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就一般而言，劳动者是具体物质生产生活劳作的行动者和实施者。劳动者在生命繁衍和生存需求的驱动下，依据具体的劳动形式，实施具体的劳动过程，并以此获得相应的劳动生产成果，如此延续生命和维持生存。因此，从任何一个社会存在状态而言，劳动者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真正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一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属性完全可以从处于这个社会中的劳动者的定位中窥见一斑，甚至，这个社会所制定的法律，以及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辩护理由，都是基于社会劳动者的定位而来的。就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而言，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劳动方式所致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才得以形成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就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思想家而言，他们恰恰不是独立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之外，而是对以上生产

方式所致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建构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和规律的确定。然而，这个理性反思的起点恰恰源于劳动者所基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社会存在方式。所以，对自下而上的有关劳动者的生产史、生存史、社会史以及观念史等方面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基于劳动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

当我们把劳动者基于劳动形式、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这三者的完全一致，作为对劳动者分析的出发点时，社会对劳动者的定位恰恰反映在社会对劳动者这三者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上。最原初的劳动者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也就是在原始社会中，劳动者这三者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劳动者处于完全被支配地位，他们并不是作为社会的自由个体，而是只能作为属于某位奴隶主私人领域的一个附属物。劳动者不能介入任何公共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劳动成果只能处于私人化的绝对被支配的形式之中。当公共领域没有任何劳动者的参与时，公共社会政治领域只能属于劳动者的支配者——贵族。而他们从事的所谓政治行动和政治活动，在脱离劳动和劳动者的状况下，所能实现的政治设计只能为主人和统治者服务。这种政治制度把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仅仅作为主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这种政治制度的法律仅

仅是体现对劳动者支配的专制权力，同时，有关正义和自由等政治合法性辩护并不涉及有关奴隶主私人领域的劳动者，而只涉及社会公共领域中贵族之间的政治行动和社会交往。因此，所谓正义和自由与劳动者无关。事实上，古希腊政治理论是一种脱离劳动者的政治原则。有关正义和自由等政治理念是贵族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的政治游戏规则。

由科学技术兴起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出现了全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产业工人这种大规模集约化的一线工业劳动者，他们基于初步的职业技能和技术知识从事相对统一的劳动工种和劳动职业。就此而言，近代资本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已经完全脱离了古代时期属于奴隶主私人化的形式，甚至也脱离了手工业作坊的工匠所具有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的私人化形式，而进入了由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所确定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的公共化时代。劳动者与劳动形式、劳动过程相分离，劳动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和技术化使得劳动者被强制性地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技术体制和职业制度内，劳动者完全丧失了工匠的私人化的劳动属性，劳动者完全同质化而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共产品。如此，劳动者的自主性就完全丧失了。同样，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也使得劳动者与劳动成

果分离。产业工人不可能像农民一样自耕自主，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基于商品购买和商品消费的市场化形式。劳动者的生存和需求也同样被限定在一个商品消费的公共需求体制中，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同样也完全同质化，从而使得劳动者成为“单向度”的“物”，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劳动者劳动的自主性以及生存方式的自主性完全丧失，从而退化成为一种公共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对这种公共领域的管理和统治，以及对劳动利益的占有又完全是一种私人化形式，也就是对劳动者本身的劳动统治，以及对劳动者创造的劳动利益的私人化形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化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和财富、利益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劳动和需求的公共性与分配和利益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有关劳动的统治方式和利益的分配方式完全趋于一种私人化领域时，在所谓社会公共领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设计中，制度建构的核心并不主要涉及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权利维护模式，而是以资本和财富为根本的利益主导模式和管理支配模式。资本和财富已经凌驾于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之上、凌驾于社会劳动者之上，而成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力量，而这种主导力量又由于完全是一种私人化的形式，因此，这个社会终究是以某种私人利益集团的形式来主导这个公



共的社会，公共性的社会是由私人的个别力量所控制。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是完全针对这种现象而对应设计的。同样，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系，由于它关注的不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是占有资本和财富的人，因此，这种民主政治是对拥有资本和财富的人政治权力、经济权利的合法性辩护，而不是对劳动者所具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合法性辩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资本与劳动的颠倒、财富与权利的颠倒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颠倒。

正如在古代时期，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作为劳动者的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参与社会公共政治活动的，贵族才是社会公共政治领域的主体，正义和自由等政治理念，以及节制和中庸等政治气质，都是贵族政治游戏的标准配置，而不是所有人的政治条件。同样，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也没有权利参与社会公共政治活动。虽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仅仅关注门第和血统，但最关注的是步入公共社会领域的资本和财富的数量等级。资本和财富，而不是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成为参与社会公共政治活动的标准配置。

所以，当我们把劳动者作为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真正基础，劳动者为整个社会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

件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古代时期，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在创造社会物质条件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社会政治的建构之中。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劳动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建构是相分离的。而这种分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劳动成果完全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对这三者完全不具有任何自主的支配性，而是处于一种绝对的被支配方式。就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所具有的同质化形式而言，劳动者已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而处于市场的商品交换之中。同时，劳动者对本身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和劳动价值也不具有任何的支配性。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商品交换，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只能属于拥有资本支配权和劳动管理支配权的私人化占有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对劳动者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施加在劳动者身上的两个支配形式，这就是，资本和财富的私人性支配与生存和需求的公共性支配。劳动者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所支配，而这个支配的力量恰恰源于劳动者不可能参与和介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于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行批判所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真正实现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这三者的完全一致，实现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自由支配。劳动者并不作为某种公

共商品而处于强制性的劳动和交换之中，同时，劳动者也并不处于某种公共的消费和需求从而被强制性地生活。自由劳动者的解放恰恰是包括私人化领域和公共化领域在内的一切强制性支配性的解放。如此，才能真正还原或回归到作为劳动者自主性支配的生命个体的自我实现方式之中。显然，回到劳动者本身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对劳动和生活的强制性体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垄断性体系的强烈批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下劳动者劳动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批判，绝不能得出回到自耕自主的农业时代的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或者回归到手工业工匠的劳动状况之中的结论。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绝对性自我支配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的绝对个体化方式。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恰恰在于改变了农耕时代劳动的分散性和个别性，使得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建立在一种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技术程序之上。这是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因此，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批判，不是对工业化本身的批判，也就是说，不是对工业化所致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的技术统一性和标准性的批判，而是对用这种技术统一性和标准性对人的界定和确定的批判。科学时代的人的

确借助于工业化所能提供的任何公共性手段，来得以劳动和生存。但是，人并不是这种工业化所致的公共产品，人并不是像工业化的商品那样是一个人工制造物，而是一个具有真正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实质是，在科学时代，人如何借助于工业化所能提供的任何公共性手段，从而真正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如何在公共性领域——工业化时代的中间环节下（他物性），去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私人性（自我性）。因此，就资本主义而言，前者公共性所具有的确形式就是作为后者生命个体的确定形式，这就是对后者而言的劳动异化、生活异化和生命异化。我们不是因噎废食，否定所有工业化成果，而是去重新审视工业化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结构，去重新发现工业化时代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

因此，这里涉及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极力驳斥黑格尔绝对哲学的原因。在黑格尔绝对哲学看来，劳动者在实际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显现的自我异化，必须历经双重否定，才能真正显现基于“绝对精神”的“绝对理性”。换言之，作为生命个体的劳动者具有某种偶然性和多样性，他们的意愿以及各自的权利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状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社

会，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妥协的绝对经济权利。针对这种利益的冲突和权利的分化，必须建立一个理性的国家和神圣的社会，如此才能调和社会个体的各种权利和意愿。这就是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所基于的某种普遍的理性和一般的理念对生命个体的一次否定。然而，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正如我们在实际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恰恰是对劳动者利益的私人化占有、对劳动者的社会劳动管理和统治的一种哲学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的辩护，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全面异化的合法性辩护。甚至，黑格尔哲学更进一步认为，这种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所体现的普遍理性恰恰证明了“绝对精神”中“绝对理性”的终极原则，是人类、自然、历史、社会的最高原则。这种人类历史中的“绝对理性”，预示着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终极宿命，如此，黑格尔“绝对理性”的神学意义完成了对人和社会的二次否定。就此，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症结，这就是，由劳动者以及他们所构成的社会，并由此建立的国家 and 法律，都是对“绝对理性”的显现和证明。世上万事万物都是为显现“绝对理性”的神圣而由此获得意义。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宗教思想对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最终意义。

当一切现实事物都为证明某种绝对神圣观念而获得存

在的意义时，一切现实事物自身肯定性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在“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和自我显现中，现实事物不断被扬弃，如此体现“绝对观念”最高目的和最高原则。黑格尔哲学试图克服康德哲学有关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二元论矛盾，就此以绝对观念自我运动和自我显现的一元论，来弥补存在与现象的二元论。然而，黑格尔哲学无论怎样强调绝对观念必须经由现实事物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得以呈现，其哲学终究设定了现象和本质、特殊和普遍、具体和一般等之间的鸿沟。这种实质上的二元论终究没有摆脱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自始至终认为，具体现实的人和物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只有对这些具体特殊现象的否定，才能真正获得普遍的本质规律。就此，从柏拉图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始终强调理性知识和普遍观念的优先性和绝对性。因此，在理性和观念至上的前提下，有关劳动者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并由此围绕着物质生产所生成和塑造的家庭、社会、国家等，都不具有它们各自的自主性的肯定性形式，只有对它们进行否定，从而纳入有关绝对理性和绝对观念的形式中，它们才具有各自的意义。

否定或鄙视劳动，还是肯定或赞美劳动；尊重人类生命延续和生存需求的世俗生活，还是沉迷于纯粹精神世界

的沉思生活；劳动者所创造的物质生活世界并由此形成的社会和国家，还是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之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历史理性”或“历史意识”；历史是物质生产劳动形式——生产力本身的时间性使然，还是“绝对观念”自身演化和自身实现的历史性呈现？站在时代的立场上，站在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观念的总体批判上，马克思在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实践上彻底实现了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倒转和颠覆。

从理性知识和精神观念转到生命生存和生产劳动，从最高理念和最高原则转到具体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状况，从有关理性反思的知识论和本体论转到有关物质生产劳动的生存论和发生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真正落实到人类历史最为基础的社会层面——劳动者这个社会层面，无论是从人自身的生命延续，还是从为社会的发展延续提供最基本和最现实的物质保障，劳动者的生存需求，劳动者在具体现实生存和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生产方式，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分析劳动者本身生命生存的出发点，也是分析社会存在方式的出发点。对劳动者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和占有方式，是塑造和形成社会政治制度形式的最直接原因。与黑格尔哲学不同，马克思有关社会政治制度形式绝非人类理性知识和普

遍观念的直接性产物，有关社会政治制度形式绝对不具有黑格尔有关普遍概念和抽象原则的观念精神属性，而具有马克思有关劳动者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具体现实的物质属性。围绕着劳动者的生存和需求所以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式，如此真正构建一个社会公共领域，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历史构建形式，体现了作为生命个体的劳动者的生存和需求所显示的私人性和由生产劳动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所构成的社会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公共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被非劳动者的私人性所占有，从而凌驾于劳动者和社会公共领域之上。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恰恰要重新确立作为劳动者的个人权利如何在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公共性中得以维护和实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劳动者经济权利的维护，与经济自由主义以财富和资本为导向的经济权利的自我保全原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劳动者（人）与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自然）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权利及其本身的价值必须与其具体的实际劳动行为和劳动过程相一致，在经历了这个具体的劳动方式之后，才创造出劳动成果。这种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关系并不是以某种财富和财产的占有形式，而是维护和满足劳动者的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促使劳动者在具体的



劳动实践中进行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劳动创造人。人的本质在具体劳动实践过程中得以塑造——人的自然化，同时具体劳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财富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仅仅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而不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自然的人化。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经济自由主义的权利自我保全理论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脱离劳动者自我本质实现的目的趋向，漠视和摆脱具体的劳动实践过程，把一切劳动产品和劳动财富以纯粹占有的方式，作为人的最高目的和最终评判原则。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经济人”假设学说关注的并不是一个劳动者在其具体劳动行为中得以生命的延续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以某种独立量化的财富占有方式作为人权利的唯一衡量方式。“经济人”假设中的个人权利概念是不涉及人的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它仅仅基于无条件、无限制、无约束、无前提的“物化”概念——“拜物教”形式。这种绝对的自由主义权利概念表面上是对人权利的纯粹界定，但实质上，它是以对“物”的占有和对“物”的消费，作为人权利的唯一基础。为此，有关人权利的界定就是以某种感性材料和感官现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界定方式。所以，人的权利概念离开了人本身的要求和含义，而完全异化为某种感性的事物对象（财